

引用格式:郑焯,王艺伟,鲍徐涵.“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J].技术经济,2024,43(9):18-31.

ZHENG Ye, WANG Yiwei, BAO Xuhan. Reform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resources bricolage and persistent innovation of SMEs[J]. Journal of Technology Economics, 2024, 43(9): 18-31.

“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

郑焯^{1,2}, 王艺伟¹, 鲍徐涵¹

(1. 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72;

2. 西北工业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西安 710072)

摘要:“放管服”改革是促进企业减负松绑,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当前学界在“放管服”改革如何影响企业持续创新方面缺乏研究探讨。本文以国内441家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理论构建并实证检验了“放管服”改革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放管服”改革及三个维度(简政放权、政府监管、公共服务)皆对中小企业资源拼凑及中小企业持续创新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其中公共服务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政府监管对资源拼凑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②资源拼凑在“放管服”改革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探索式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比利用式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更显著;③进一步分析表明,“放管服”改革的影响效果在不同行业、不同年份及不同区域的企业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凝练了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放管服”改革;企业持续创新;资源拼凑

中图分类号: D630; F27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24)09-0018-14

DOI:10.12404/j.issn.1002-980X.J24051615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点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国家层面的“放管服”改革相关政策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公平、透明和便利的发展环境。截至2023年底,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全国中小微企业数量超过5200万家。企业经营实力不断加强,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从业人员数量等方面都有显著增长,经济贡献稳步提高^[1]。但不可否认,“放管服”改革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題,如部分地区行政审批流程依旧比较繁琐、行业监管体系不够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不足等,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索“放管服”改革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推动作用,激发企业活力,唤醒企业创新的生命力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2]。

当前学界关于“放管服”改革与企业持续创新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但围绕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因素以及“放管服”改革单一维度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却有一些,这也为本文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关于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学者主要从R&D投入^[3]、企业家精神^[4]等企业内部因素,技术多元化^[5]等企业外部因素研究对其的影响,但现有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多聚焦于企业内部因素,较少从“政府”这一外部视角进行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关于“放管服”改革单一维度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有学者从简政放权角度出发,认为政府通过简政放权能够提高企业的组织绩效^[6]、企业创新绩效^[7],同时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8];还有学者从政府监管角度出发,指出通过加强政府监管能为企业提

收稿日期:2024-05-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创新政策工具及组合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7200418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放管服’改革促进陕西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研究”(2022R031)

作者简介:郑焯,博士,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绩效管理、政府改革创新,科技政策与管理;王艺伟,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创新管理;鲍徐涵,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

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对企业创新^[9]、创新动力^[10-11]等产生显著影响;此外,还有学者从公共服务角度出发,强调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能为企业创新资源获取^[12]、企业目标实现和企业绩效提升^[13]等产生积极作用。总之,当前学界缺乏围绕“放管服”改革影响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及其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且关于“放管服”改革影响效果的异质性分析也需要进一步拓展。

鉴于此,本文的主要问题是“放管服”改革是否影响及如何影响企业持续创新?为探索此问题,本文立足于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拼凑理论三个理论,通过梳理现有的文献,构建“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以S省X市、Y市、H市三地441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揭示“放管服”改革影响企业持续创新的路径和效果并验证假设,旨在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企业持续创新等方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一) 理论基础

1. 制度理论

综合近期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观点,本文以制度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制度理论主要关注社会结构问题,探索不同元素组合、排列方式及其在社会体系中的生成与演变过程^[14],强调组织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认为社会环境中的规范、规则和文化观念对组织的运作具有深远的影响^[15]。该理论阐述社会结构具有韧性与多层次性,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元素形成、冲突、整合与消弭等一系列动态过程^[16],认为组织创办与管理经营企业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动态过程,因此借助制度理论可以为研究企业的持续创新行为提供理论支持^[17]。以此视角来看,“放管服”改革通过简化行政程序、加强监管效能和优化服务,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激励,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促进了企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2. 资源拼凑理论

“资源拼凑”这一概念源自Baker和Nelson^[18]对29家资源受限企业的分析,该理论主要是指在资源受限环境中,将现有资源,特别是隐藏的、分散的或未充分利用的资源,战略性地结合起来为企业创造独特的、更大的价值。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研究,将资源拼凑分为“利用式资源拼凑”和“探索式资源拼凑”两维度。“利用式资源拼凑”是指企业可以通过采用拼凑利用方式整合企业已有资源以解决资源约束的束缚^[19];“探索式资源拼凑”是指企业可以通过持续的探索方式获取之前已存在但企业未利用过的“新”资源来应对新挑战^[20]。以此视角来看,“放管服”改革通过简化审批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通过加强监管保障了市场公平,通过优化公共服务提升了企业运营效率,这都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和资源整合利用机会,从而促进其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3. 交易成本理论

学术界广泛应用交易成本理论来研究政治学、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的问题^[21]。交易成本理论是指可以借助外部制度来帮助企业实现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减少企业在生产与创新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22]。以此视角来看,通过政府“放管服”改革简化审批流程,节约审批程序的时间,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审批成本,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与时间用于创新活动。因此,以交易成本为理论基础,可以帮助探索“放管服”改革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意义与作用。

(二) 研究假设提出

1. “放管服”改革与企业持续创新

“放管服”改革是我国政府为优化行政管理与服务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实施的一系列综合性改革措施^[23]。参考以往研究观点,本文从“简政放权”“政府监管”“公共服务”三个维度研究“放管服”改革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企业持续创新^[24]。首先,简政放权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赋予企业自主权,从而为企业提供公平宽松的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创新^[25]。其次,政府监管指的是在强化市场监管的同时,做到合理放权,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和竞争秩序。科学合理的政府监管制度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6-27]。最后,高效运作的公共服务体系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放管服”改革通过公共服务优化能够为企业创新提供大量创新资源,提

升企业创新活力^[28]。政府提供各类基础性公共服务在促进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提高企业创新效率^[29]。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

“放管服”改革对企业持续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

简政放权对企业持续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a);

政府监管对企业持续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b);

公共服务对企业持续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c)。

2. “放管服”改革与资源拼凑

“放管服”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职能转变措施,通过简政放权、政府监管、公共服务三个方面促进中小企业有效拼凑和利用所需资源。具体来说,首先,在简政放权方面,政府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和集中处理审批事项,提高了审批效率,减少了中小企业在获取必要许可和资质时的时间成本,为中小企业节省出时间资源^[30-31];其次,在政府监管方面,政府通过加强对市场秩序的监管有效地减少了非正规竞争行为,营造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助于中小企业更容易地获取和利用市场资源^[32];最后,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通过完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为企业吸引和留住关键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持^[33-34],进一步实现人才资源的有效拼凑和利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2:

“放管服”改革对资源拼凑有显著正向影响(H2)。

如前文所述,放管服改革包括简政放权、政府监管、公共服务三个维度,且资源拼凑分为利用式资源拼凑、探索式资源拼凑两类,因此进一步提出了假设H2的子假设:

简政放权对探索式资源拼凑有显著正向影响(H2a);

简政放权对利用式资源拼凑有显著正向影响(H2b);

政府监管对探索式资源拼凑有显著正向影响(H2c);

政府监管对利用式资源拼凑有显著正向影响(H2d);

公共服务对探索式资源拼凑有显著正向影响(H2e);

公共服务对利用式资源拼凑有显著正向影响(H2f)。

3. 资源拼凑与企业持续创新

在资源拼凑理论框架下,企业面临资源约束时可利用资源拼凑策略审视当前现有资源的利用方式,重新赋予现有资源新的定义与价值,从而帮助突破困境,迎来新的发展机遇^[35],因此本文认为企业的资源拼凑行为对于推动企业持续性创新具有积极作用。通过资源拼凑开发和运用异质性资源有助于企业形成独特竞争优势,进而促进其创新能力的增强^[36]。利用式资源拼凑包括对现有资源的分解重构,扩展可利用资源范围,支持创新活动^[37]。探索式资源拼凑则是基于已有经验的再创造过程,通过利用积累的经验指导资源的创新性组合,深化对资源价值的理解,提升企业资源整合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资源拼凑对企业持续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H3);

探索式资源拼凑对企业持续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H3a);

利用式资源拼凑对企业持续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H3b)。

4. 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

前文分析已经表明,“放管服”改革对企业资源拼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企业的资源拼凑对提高企业持续创新也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放管服”改革能够为企业营造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规范的制度环境、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以帮助进行企业资源拼凑等;另一方面,资源拼凑有助于企业扩展资源的多重应用和价值,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的效率,从而促进连续性创新能力的增强^[38]。资源拼凑鼓励企业在多个层面尝试不同资源的利用方式,可以显著增强企业开发资源和创新运用能力,同时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机遇获得高价值异质性资源和竞争优势^[39],以此进一步促进企业的持续

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4:

资源拼凑在“放管服”改革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H4);

探索式资源拼凑在简政放权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间起中介作用(H4a);

利用式资源拼凑在简政放权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间起中介作用(H4b);

探索式资源拼凑在政府监管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间起中介作用(H4c);

利用式资源拼凑在政府监管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间起中介作用(H4d);

探索式资源拼凑在公共服务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间起中介作用(H4e);

利用式资源拼凑在公共服务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间起中介作用(H4f)。

综上,本文通过综合整理和总结先前的理论研究文献,结合当前企业的发展状况,建立了关于“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和企业持续创新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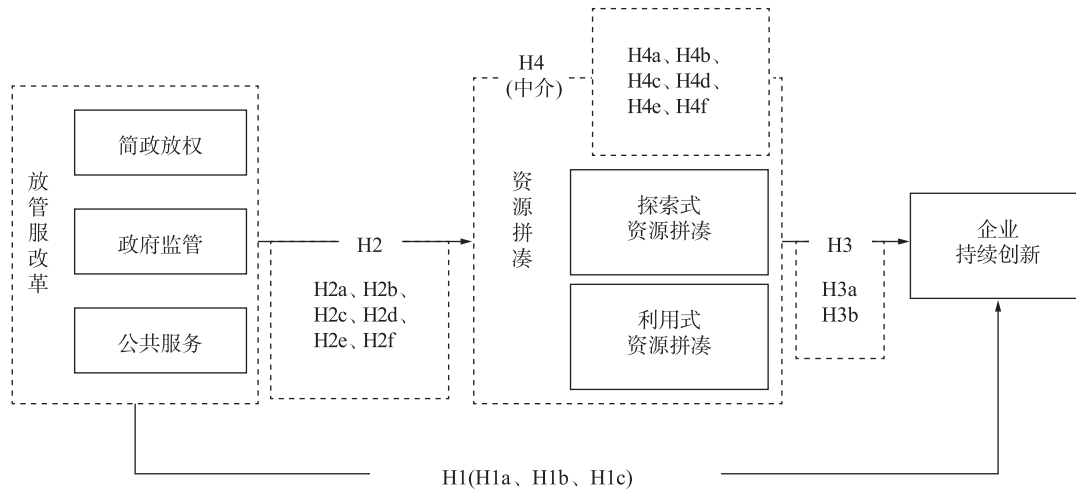


图 1 “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的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 问卷与样本

本文以 S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在 X 市、Y 市、H 市三个城市进行问卷发放。S 省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省份,科教资源丰富,科技创新生态活跃,创新驱动持续增强,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活跃度较高。本文选取了 S 省创新能力最突出的 X 市、Y 市、H 市三个市,其中 X 市获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拥有科技研发、人才集聚等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Y 市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在能源化工、新材料等产业领域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而 H 市的企业创新水平名列前茅,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本文的调研方式包括:①线上调研,通过问卷星平台制作电子版问卷链接,在企业微信、QQ 群内进行电子版问卷发放以供回收;②线下调研,研究团队实地走访了四地的高新区和工业园区进行调研。本次调研共回收正式版调查问卷 608 份,去除重复填答、填答不完整及存在明显数据错误的样本后,最终获得 441 份有效问卷,整体有效回收率为 72.53%。

为确保本次问卷回收能得到尽可能高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对样本质量进行了控制:①为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在企业基本信息设计时专门增添了从业人数、研发人员比重、被试现任职务等题项。②制定个别问卷筛选条件,例如,基于前期测试结果设置问卷填答时间,设置 2 个陷阱题用来清理随意填答问卷。③同源偏差(common variance)检验,本文在访谈和预调研基础上再进行正式调研,以确保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和结果的准确性。在数据处理上采用因子分析法,结果显示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8.612%,各回归的 VIF 值均小于

10,表明本文的结果并未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影响。④此外,本文通过正态分布检验明确了研究数据符合正态分布,适宜进行后续的实证研究。

(二) 变量定义与测量

为了确保量表信效度,本文借鉴现有国内外研究制定的成熟量表,进一步结合研究的特点,经过多轮修改之后确定了研究量表。主要研究变量的名称及测量指标、题项等具体包括:

(1)因变量为企业持续创新,国内外主流文献指出持续创新通常指过去创新与现在创新之间的对比关系,是企业对过去结果反馈与积累的过程^[40],因此本文借鉴了这一做法进行企业持续创新的测量。在测量企业持续创新的具体指标维度方面,参考了钱锡红等^[41]、何郁冰等^[5]开发的测量工具^[41],从企业的利润率、市场份额、产品改进和创新、新技术应用及管理制度的优化的前后期对比来反映企业创新的持续程度,并观测了具体指标与前三年相比是否发生明显变化。

(2)自变量为“放管服”改革,“放管服”改革是我国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包含了简政放权、政府监管及公共服务三个维度^[24]。具体而言,简政放权主要借鉴了 Samina 和 Abdu^[42]及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中的相关测量题项,形成4个测量题项包括审批手续及流程简化、市场准入条件拓宽、市场主体责任强化、多头执法及重复执法情况减少等方面。政府监管的测量主要借鉴了杨震宁和李东红^[26]的测量题项,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专利申请的批复效率、政府对企业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标准的监管,以及政府对企业生产及经营活动在环境影响方面的监管4个方面进行测量。公共服务的测量主要借鉴了 Van Ryzin 开发的地方公共服务质量测量工具以及张立荣^[43-44]开发的测量工具,公共服务题项包括市政工程施工服务、社会保障服务、技术服务平台和人才交流服务平台。

(3)中介变量是资源拼凑,Baker 和 Nelson^[18]提出“资源拼凑”是一种运用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以解决问题或抓住机遇的策略,即企业可以巧妙地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突破资源利用的局限,通过重新组织或创新性应用,开创更多资源的利用途径,有助于解决新问题或抓住新机遇的演进过程。资源拼凑的测量主要借鉴了 Senyard 等^[45]提出的测量题项,同时结合我国中小企业进行资源拼凑的现实情境,对该量表的题项稍加调整,最终合成了资源拼凑的量表共包含6个题项,前3个题项为利用式资源拼凑,后3个题项为探索式资源拼凑。

(4)控制变量选择了企业类型、企业年龄、销售收入、研发人员数量、研发投入、负责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任职时长9个变量,依据此对企业和企业负责人的基本特征进行控制。

四、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

(一) 信效度检验

为确保调研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对本文研究的“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三个变量及其维度进行信度分析。由表1可知,简政放权、政府监管、公共服务的 Cronbach' α 值分别为 0.902、0.917、0.936;利用式资源拼凑、探索式资源拼凑的 Cronbach' α 值分别为 0.948、0.958;企业持续创新的 Cronbach' α 值为 0.973,各维度 Cronbach' α 值均大于 0.9 表明本问卷信度良好。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过程中,首先,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得出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5,符合标准。其次,“放管服”改革各维度的 KMO 值分别为 0.845、0.837、0.831;资源拼凑两个维度的 KMO 值分别为 0.767、0.775;企业持续创新的 KMO 值为 0.941;各维度的累计解释方差均大于 70% 且显著性概率均为 0.000,表明各变量间相关性较强,适于进行深入分析。

此外,由表1验证性因子分析所得结果可以看出,“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及企业持续创新的各个维度均的路径载荷均大于 0.8,且各变量的 AVE 均大于 0.6,CR 均大于 0.9 完全符合标准,说明各维度对其对应变量的衡量具有有效性。

(二)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1)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被调研者基础信息汇总结果如表2所示,企业所属行业支柱产业、装备产业(依据郑焯等^[12]进行分类)相对占比较高,分别为 31.5%和 28.6%,都市产业占比最少为 13.4%;企

表 1 变量及其信效度、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维度	指标指向	CITC	删除项后的 α	Cronbach' α	因子载荷	KMO	累计解释方差	AVE	CR	拟合指标
“放管服”改革	简政放权	简政 1	0.761	0.880	0.902	0.817	0.845	77.269	0.698	0.903	CFI:0.969 IFI:0.969 NFI:0.959 RMR:0.017
		简政 2	0.797	0.867		0.845					
		简政 3	0.811	0.862		0.862					
简政 4		0.753	0.883	0.818							
政府监管	监管 1	0.816	0.889	0.917	0.854	0.837	80.065	0.708	0.906		
	监管 2	0.826	0.887		0.843						
	监管 3	0.805	0.893		0.835						
	监管 4	0.791	0.898		0.833						
公共服务	服务 1	0.788	0.937	0.936	0.830	0.831	84.171	0.793	0.939		
	服务 2	0.876	0.908		0.906						
	服务 3	0.872	0.910		0.912						
	服务 4	0.866	0.912		0.912						
资源拼凑	利用式资源拼凑	利用 1	0.885	0.928	0.948	0.921	0.767	90.629	0.861	0.949	
		利用 2	0.912	0.908		0.948					
		利用 3	0.878	0.934		0.914					
探索式资源拼凑	探索 1	0.916	0.934	0.958	0.949	0.775	92.242	0.884	0.958		
	探索 2	0.921	0.930		0.953						
	探索 3	0.895	0.950		0.918						
企业持续创新	企业持续创新	创新 1	0.875	0.971	0.973	0.896	0.941	84.884	0.824	0.974	
		创新 2	0.900	0.970		0.921					
		创新 3	0.911	0.969		0.932					
		创新 4	0.900	0.970		0.919					
		创新 5	0.894	0.970		0.903					
		创新 6	0.900	0.969		0.901					
		创新 7	0.896	0.970		0.895					
		创新 8	0.892	0.970		0.893					

注:指标指向列,文字后数字代表变量的几个测量题项;CITC表示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CFI为比较拟合指数;IFI为增值拟合指数;NFI为规范拟合指数;RMR为均方根误差。

业规模在 20~300 人的占比最多,为 51%;高新企业在被调研企业中占比为 76.2%;2022 年营销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占比 61%;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总收入 5%以下的有 57.8%;企业年限在 10 年以上的较多,占别为 48.1%。此外,绝大多数企业都认为自己对“放管服”改革有所了解。

(2)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利用 SPSS 25.0 软件对“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及企业持续创新三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据表 3 可知,“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及企业持续创新等各变量均在 $P=0.05$ 的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放管服”改革与资源拼凑之间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为 0.764,表明政府“放管服”改革的水平越好,企业资源拼凑能力越强。另外“放管服”改革与企业持续创新的相关性系数是 0.648,表明政府“放管服”改革水平越好,企业持续创新能力越强。资源拼凑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性明显强于“放管服”改革举措,相关系数为 0.681。

表 2 各研究变量描述性分析

样本特征	样本分布	频数	占比(%)	样本特征	样本分布	频数	占比(%)
所属行业	支柱产业类	139	31.5	2022 年的 销售收入	300 万元以下	49	11.1
	装备产业类	126	28.6		300 万元~2000 万元	127	28.8
	新兴产业类	117	26.5		2001 万~4 亿元	148	33.6
	都市产业类	59	13.4		4 亿元以上	117	26.5
企业规模	20 人以下	171	38.8	企业研发 人员占比	10% 以下	94	21.3
	20~300 人	225	51.0		11%~15%	85	19.3
	301~1000 人	33	7.5		16%~20%	66	15.0
	1000 人及以上	12	2.7		21%~25%	49	11.1
所属地区	H 市	108	24.5		26%~30%	33	7.5
	Y 市	102	23.1		30% 以上	114	25.9
	X 市	231	52.4	企业研发投入 占销售总收入	1% 及以下	113	25.6
是否高新 技术企业	是	336	76.2		2%~5%	142	32.2
	否	105	23.8		6~10%	144	32.7
是否了解“放 管服”改革	完全了解	65	14.7		11% 及以上	42	9.5
	了解	376	85.3	企业年限	5 年及以下	74	16.8
			6~10 年		155	35.1	
			11 年及以上		212	48.1	

表 3 各研究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1	13
1. 所属行业	1												
2. 企业规模	0.056	1											
3. 是否高新产业	0.001	0.104*	1										
4. 销售收入	0.095*	0.677**	0.075	1									
5. 研发人员占比	0.084	0.036	0.339**	0.074	1								
6. 研发投入占比	0.053	0.099*	0.480**	0.205**	0.486**	1							
7. 性别	0.067	0.053	0.181**	0.092	0.123*	0.096*	1						
8. 年龄	0.025	0.039	0.093*	0.020	0.037	0.056	0.165**	1					
9. 学历	0.019	0.284**	0.247**	0.219**	0.253**	0.183**	0.002	0.130**	1				
10. 工作年限	0.056	0.136**	0.132**	0.146**	0.001	0.017	0.001	0.412**	0.004	1			
11. “放管服”改革	0.001	0.164**	0.082	0.178**	0.039	0.079	0.042	0.056	0.039	0.054	1		
12. 资源拼凑	0.071	0.148**	0.055	0.152**	0.032	0.067	0.053	0.085	0.062	0.100*	0.764**	1	
13. 企业持续创新	0.055	0.067	0.003	0.056	0.112*	0.155**	0.085	0.112*	0.129**	0.101*	0.648**	0.681**	1

注：*** 表示 $P < 0.001$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三) 模型拟合度检验与假设检验

1. 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文使用 AMOS 24.0 软件对构建的“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关系的假设模型进行拟合指数检验,结构模型拟合图如图 2 所示。根据表 4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可知,卡方值 χ^2/df 为 1.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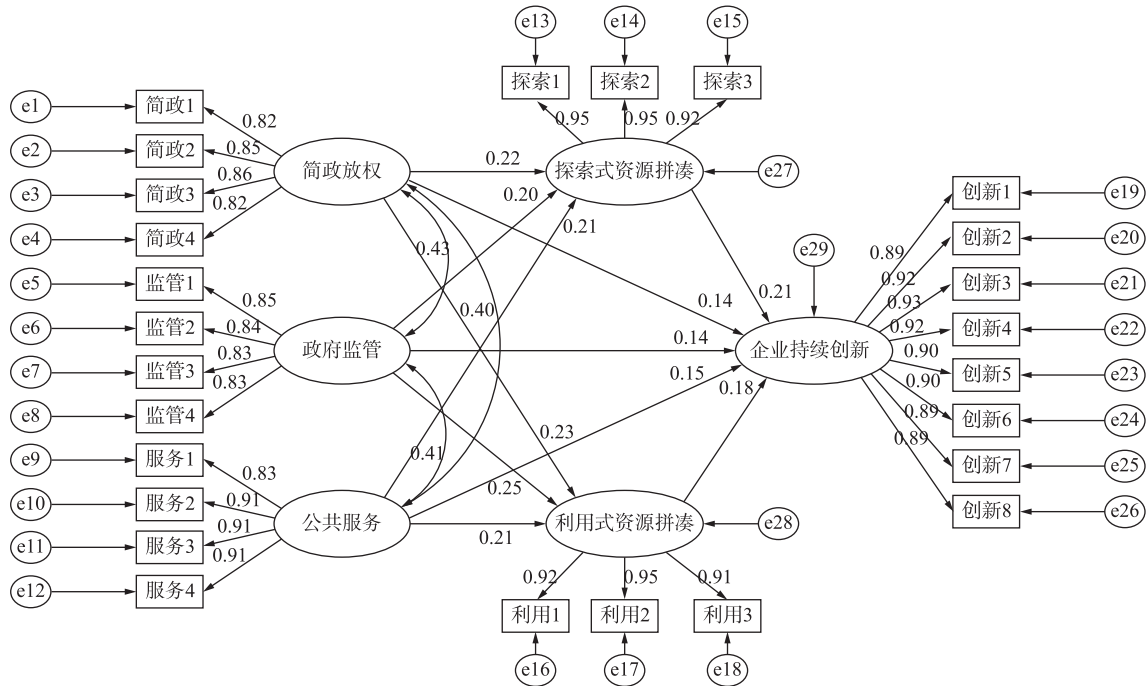


图 2 结构模型拟合图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指标	卡方值/自由度 (χ^2/df)	拟合优度指数 (GFI)	调整后拟合度 指数 (AGFI)	规范拟合 指数 (NFI)	标准化拟合 指数 (TLI)	比较拟合 指数 (CFI)	近似均方根 误差 (RMSEA)
统计值	1.597	0.931	0.943	0.946	0.965	0.968	0.053
参考值	<3	>0.8	>0.8	>0.9	>0.9	>0.9	<0.08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小于 3;拟合优度指数 *GFI* 为 0.931,调整后拟合度指数 *AGFI* 为 0.943,均大于 0.8;规范拟合指数 *NFI* 为 0.946,标准化拟合指数 *TLI* 为 0.965,比较拟合指数 *CFI* 为 0.968,均大于 0.9;近似均方根误差 *RMSEA* 为 0.053,小于 0.08。因此,该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较高。

2. 模型主效应检验

“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数据如表 5 所示,该结果说明:在简政放权、政府监督与公共服务对探索式资源拼凑的影响路径中,均能够在 $P<0.001$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资源拼凑,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225、0.204、0.210,因此假设 H2a、假设 H2c、假设 H2e 分别得到验证,其中简政放权对探索式资源拼凑的正向促进效果最显著;在简政放权、政府监督与公共服务对利用式资源拼凑的影响路径中,均能够在 $P<0.001$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利用式资源拼凑,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234、0.247、0.208,因此假设 H2b、假设 H2d、假设 H2f 分别得到验证,其中政府监督对利用式资源拼凑的正向促进效果最显著;在简政放权、政府监督与公共服务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路径中,均能够在 $P<0.01$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持续创新,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141、0.138、0.154,因此假设 H1a、假设 H1b、假设 H1c 均得到验证,其中公共服务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最显著。

3. 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检验

“放管服”改革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间接路径是以影响企业资源拼凑实现的。为了全面探究上述两种影响路径,本文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其中介效应进行分析与验证。

表 6 为 Bootstrap 方法的模型效应分析计算结果。结果显示,“放管服”改革影响中小企业改革的直接效应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	临界比率	P	结果
简政放权	→	探索式资源拼凑	0.225	0.053	4.065	***	显著
政府监管	→	探索式资源拼凑	0.204	0.082	3.643	***	显著
公共服务	→	探索式资源拼凑	0.210	0.061	3.74	***	显著
简政放权	→	利用式资源拼凑	0.234	0.046	4.174	***	显著
政府监管	→	利用式资源拼凑	0.247	0.072	4.303	***	显著
公共服务	→	利用式资源拼凑	0.208	0.053	3.644	***	显著
简政放权	→	企业持续创新	0.141	0.047	2.61	**	显著
政府监管	→	企业持续创新	0.138	0.073	2.529	**	显著
公共服务	→	企业持续创新	0.154	0.054	2.817	**	显著
探索式资源拼凑	→	企业持续创新	0.206	0.046	4.028	***	显著
利用式资源拼凑	→	企业持续创新	0.176	0.058	3.21	**	显著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中介路径	标准化效应值	标准误	偏差校正后的 95% 置信区间		P	百分位校正后的 95% 置信区间		P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简政放权→企业持续创新	0.141	0.057	0.022	0.249	0.017	0.032	0.254	0.011
	政府监管→企业持续创新	0.138	0.054	0.027	0.246	0.012	0.030	0.245	0.011
	公共服务→企业持续创新	0.154	0.059	0.038	0.269	0.005	0.041	0.274	0.008
间接效应	简政放权→探索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046	0.018	0.019	0.088	0.000	0.015	0.084	0.001
	政府监管→探索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042	0.016	0.016	0.084	0.001	0.014	0.078	0.001
	公共服务→探索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043	0.016	0.019	0.084	0.000	0.015	0.078	0.001
	简政放权→利用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041	0.018	0.012	0.086	0.006	0.007	0.079	0.019
	政府监管→利用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043	0.020	0.012	0.093	0.007	0.007	0.084	0.019
	公共服务→利用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036	0.020	0.009	0.090	0.005	0.005	0.080	0.020
总效应	简政放权→企业持续创新	0.228	0.051	0.125	0.325	0.000	0.126	0.326	0.000
	政府监管→企业持续创新	0.223	0.052	0.118	0.324	0.000	0.119	0.326	0.000
	公共服务→企业持续创新	0.234	0.057	0.121	0.345	0.000	0.123	0.347	0.000

与间接效应在偏差校正(bias-corrected)和百分位校正(percentile-corrected)后的95%置信区间上下限范围内不包含0,证明存在中介效应。简政放权、政府监管与公共服务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总效应分别为0.228、0.223、0.234。其中,三个维度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141、0.138、0.154;通过探索式资源拼凑影响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46、0.042、0.043;通过利用式资源拼凑影响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41、0.043、0.036。该数据说明“放管服”改革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部分通过影响探索式资源拼凑与利用式资源拼凑促进,因此假设H4a~假设H4f均得到验证。综合来看,探索式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较利用式资源拼凑更强。

(四)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法检验“放管服”改革、资源拼凑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三个研究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结果如表7所示,“放管服”改革的三个维度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572、0.615、0.594,这说明三个维度都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提升。三个维度对利用式资源拼凑有显著促进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0.645、0.382、0.413,对探索式资源拼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0.677、0.406、0.402,即“放管服”改革三个维度都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行利用式资源拼凑和探索式资源拼凑。加入中介变量利用式资源拼凑后,回归系数分别下降为0.267、0.335、0.272;加入中介变量探索式资源拼凑后,回归系数分别下降为0.233、0.304、0.237,表明利用式资源拼凑与探索式资源拼凑在“放管服”改革的三个维度与企业持续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假设均成立,说明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影响路径	回归系数	影响路径	回归系数
直接影响效应		间接影响效应	
简政放权→利用式资源拼凑	0.645***	简政放权→利用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267***
政府监管→利用式资源拼凑	0.382***	政府监管→利用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335***
优化服务→利用式资源拼凑	0.413***	优化服务→利用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272***
简政放权→探索式资源拼凑	0.677***	简政放权→探索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233***
政府监管→探索式资源拼凑	0.406***	政府监管→探索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304***
优化服务→探索式资源拼凑	0.402***	优化服务→探索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237***
简政放权→企业持续创新	0.572***		
政府监管→企业持续创新	0.615***		
优化服务→企业持续创新	0.594***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

(五) 进一步分析: 异质性检验

为验证“放管服”改革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年限及不同行业的企业实施效果的差异,本文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年限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8~表10所示。

表8 不同区域分组各变量的影响作用结果

影响路径	H市(N=108)	Y市(N=102)	X市(N=231)
简政放权→利用式资源拼凑	0.580***	0.653***	0.659***
政府监管→利用式资源拼凑	0.642***	0.743***	0.590***
优化服务→利用式资源拼凑	0.635***	0.804***	0.650***
简政放权→探索式资源拼凑	0.614***	0.687***	0.718***
政府监管→探索式资源拼凑	0.715***	0.777***	0.636***
优化服务→探索式资源拼凑	0.667***	0.795***	0.708***
简政放权→企业持续创新	0.428**	0.591***	0.611***
政府监管→企业持续创新	0.549***	0.626***	0.615***
优化服务→企业持续创新	0.569***	0.581***	0.601***
利用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610***	0.594***	0.675***
探索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619***	0.633***	0.685***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

表 9 不同行业分组各变量的影响作用结果

影响路径	支柱产业类 (N=139)	装备产业类 (N=126)	新兴产业类 (N=117)	都市产业类 (N=59)
简政放权→利用式资源拼凑	0.739***	0.519***	0.617***	0.721***
政府监管→利用式资源拼凑	0.789***	0.576***	0.649***	0.614***
公共服务→利用式资源拼凑	0.804***	0.623***	0.614***	0.781***
简政放权→探索式资源拼凑	0.727***	0.606***	0.662***	0.760***
政府监管→探索式资源拼凑	0.783***	0.635***	0.709***	0.653***
公共服务→探索式资源拼凑	0.784***	0.693***	0.651***	0.820***
简政放权→企业持续创新	0.692***	0.543***	0.508***	0.523***
政府监管→企业持续创新	0.685***	0.636***	0.560***	0.576***
公共服务→企业持续创新	0.659***	0.591***	0.516***	0.617***
利用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718***	0.579***	0.629***	0.666***
探索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726***	0.588***	0.677***	0.670***

注:***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

表 10 不同企业年限分组各变量的影响作用结果

影响路径	5年以下 (N=74)	5年-10年 (N=155)	10年以上 (N=212)
简政放权→利用式资源拼凑	0.722***	0.618***	0.646***
政府监管→利用式资源拼凑	0.779***	0.696***	0.606***
公共服务→利用式资源拼凑	0.803***	0.693***	0.685***
简政放权→探索式资源拼凑	0.727***	0.642***	0.697***
政府监管→探索式资源拼凑	0.781***	0.729***	0.646***
公共服务→探索式资源拼凑	0.788***	0.693***	0.741***
简政放权→企业持续创新	0.612***	0.528***	0.600***
政府监管→企业持续创新	0.630***	0.587***	0.619***
公共服务→企业持续创新	0.554***	0.572***	0.615***
利用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667***	0.638***	0.656***
探索式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	0.641***	0.657***	0.683***

注:***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

(1) 区域异质性检验。根据现有研究,本文将企业所在的区域划分为 X 市、Y 市、H 市三个区域,进一步探索“放管服”改革对资源拼凑以及企业持续创新影响的区域效应。表 8 的结果表明,在 X 市、Y 市、H 市三个区域“放管服”改革及其各维度对资源拼凑,以及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均显著。进一步比较而言,由于 X 市和 Y 市的创新企业的数量更多,且当地的创新资源和政府支持强于 H 市,因此 X 市和 Y 市的“放管服”改革三个维度的影响效果要明显强于 H 市。

(2) 行业异质性检验。根据考北京市统计局 2009 年面向企业创新能力的调查、厦门市科技局面向企业创新的调查等国内已有调查问卷,本文将企业所在的行业划分为支柱产业类、装备产业类、新兴产业类及都市产业类 4 个大类,进一步探索“放管服”改革对资源拼凑以及企业持续创新影响的行业效应。表 9 的结果表明,在所有行业“放管服”改革及其各维度对资源拼凑及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均显著,同时“放管服”改革在支柱产业类别中产生的激励效应尤为显著。

(3) 企业年限异质性检验。表 10 的结果表明,经营年限不同的企业其“放管服”改革及其各维度对资源拼凑以及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均显著。同时发现,“放管服”改革对于经营 5 年以下的企业所产生的激励作用最为明显。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创新基金、技术支持、研发补贴等支持,有助于企业推动创新和产品研发,扩大业务和进行创新投资,有效提升了处于创建初期的企业的资源拼凑能力和创新能力。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主要研究结论

“放管服”改革作为当前我国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重要抓手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一招,其是否及如何促进企业持续创新,学界对此问题缺乏系统探讨和研究。鉴于此,本文构建了“放管服”

改革、企业资源拼凑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 441 家中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放管服”改革对企业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以及资源拼凑在“放管服”改革与企业持续创新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放管服”改革实施效果的“区域效应”“行业效应”和“年限效应”等。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放管服”改革是促进中小企业提高资源拼凑能力及促进企业持续创新的重要手段,简政放权、政府监管、公共服务均能对企业的利用式资源拼凑和探索式资源拼凑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并能有效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但相比而言,公共服务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简政放权与政府监管对企业资源拼凑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这表明,政府通过财政资金补贴、建设创新平台、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支持等诸多公共服务,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市场化应用,以此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持续创新能力。同时政府通过精简机构、下放经营管理权,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也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创新环境,促进企业更好的实现资源利用与资源探索。

(2)资源拼凑在“放管服”改革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关系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放管服”改革能够通过提升企业资源拼凑能力进而促进企业持续创新。但比较而言,探索式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比利用式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更显著。这表明,探索式资源拼凑作为中介,可以促进中小企业探索更多的新资源,并帮助中小企业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或获取专业技术资源,从而推动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发展。

(3)通过对“放管服”改革的区域效应、行业效应、企业年限效应进行分析,表明在 X 市、Y 市、H 市三个区域“放管服”改革及其各维度对资源拼凑,以及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均显著;在所有行业“放管服”改革及其各维度对资源拼凑,以及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均显著,但“放管服”改革对于支柱产业类所产生的激励作用最为明显;经营年限不同的企业其“放管服”改革及其各维度对资源拼凑,以及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均显著,但“放管服”改革对于经营 5 年以下的企业所产生的激励作用最为明显。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及创新性体现在:基于制度理论、资源拼凑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等理论视角,系统提出并构建了“放管服”改革影响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理论模型,弥补了以往研究更多是从“放”“管”“服”单一维度出发,探讨其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而缺乏将“放管服”改革视为一项整体内容来揭示其影响效果的不足。与此同时,本文探讨了“放管服”改革与企业资源拼凑、企业持续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了“放管服”改革影响企业持续创新的中间过程及影响效果,并进一步识别了“放管服”改革实施效果的“区域效应”“行业效应”和“年限效应”,为后续研究政府改革与企业创新间关系拓宽了研究视角,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本文为相关政府部门促进企业持续创新的精准施策也提供了实践启示。

首先,“放管服”改革影响企业持续创新的直接效应表明:①政府部门应优化为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企业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如交通网络、信息通信技术设施、科技园区和创新孵化器等,同时为企业员工提供就业培训、住房、再就业培训等社会保障服务。在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后勤保障”的同时,政府还应通过各类科技创新平台、信息共享平台、人才交流平台的搭建,促进中小企业间及企业与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与交流。政府相关部门帮助中小企业更好的利用整合资源,推动中小企业渡过初创期并促进后续创新发展。②政府部门应重视精简机构、下放经营管理权,通过促进政府部门的“瘦身”“提效”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提升中小企业资源拼凑能力,促进企业更好的探索资源、利用资源。③政府部门应做好“合理监管”,对中小企业的业务活动进行依法监视、督促和管理,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创新环境。同时应实现政府监督与行业自律等方式并举,政府监督与多元主体监督相互补充。

其次,企业资源拼凑发挥的中介效应表明:一方面,政府应定期监测和评价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确保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得到很好执行,确保企业提出的专利申请可以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及时批复,为企业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以促进中小企业进行资源拼凑等;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着重帮助中小企业进行探索式资源拼凑,通过提高企业获取新资源的能力,开发资源的更多用途和价值,并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利用已有资源,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提高已有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

最后,“放管服”改革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年限及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存在差异,这启示政府部门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时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要一刀切。要根据区域发展特征、行业类型及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等,提供多层次的制度支持体系和梯度培育战略,放宽企业行政审批和监管制约,为企业减轻负担、提高效率、提高自身的创新效益和持续创新能力。

(三) 研究不足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关于“放管服”改革的中国特色概念和改革措施,本文主要借鉴国内外现有理论和成熟量表来对其进行测量,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未来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一问题;其次,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针对中小企业负责人的一手调研,可能会受到调研对象、调研企业类型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足,今后若能能够有效结合二手面板数据辅助调查研究,将有望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最后,本文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S省的X市、Y市、H市三个城市的企业,缺乏更大范围的样本,在未来研究中应扩大样本范围,覆盖更多区域,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 [1] 张洽,曹玉臣.基于“放管服”改革的我国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9):124-127,203.
-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马建堂,袁东明,等.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J].管理世界,2022,38(12):1-9.
- [3] MARTINI A, GASTALDI L, CORSO M, et al. Continuously innovating the study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From actionable knowledge to universal theory in continuous innovation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2, 60(3/4): 157-178.
- [4] 旷锦云,程启智.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可持续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2010(10):80-85.
- [5] 何郁冰,周慧,丁佳敏.技术多元化如何影响企业的持续创新?[J].科学学研究,2017,35(12):1896-1909.
- [6] JUNG C S, KIM S E. Structure and perceived performance in public organizations[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4, 16(5): 620-642.
- [7] 郑焯,吴建南,张攀.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J].科学学研究,2017,35(11):1737-1749.
- [8] 夏后学,谭清美,姜启波.转轨背景下简政放权与腐败对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研发产出与制度差异视角[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7,29(5):123-136.
- [9] LI H, ZHANG J, WANG C, et 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using the combined DEA model: A case study of Xi'an China[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18, 42: 355-369.
- [10] RADAELLI G, MURA M, SPILLER N, et 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shar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sational knowledge-sharing climate[J].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 Practice, 2011, 9(4): 342-352.
- [11] ZHENG Y, LI C, LIU Y.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innovation of SMEs: Evidence from China[J].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 Innovation, 2021, 22: 1-15.
- [12] 郑焯,杨若愚,张顺翔.公共服务供给、资源获取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30(4):105-117.
- [13] DURMUŞOĞLU S S, Apfelthaler G, NAYIR D Z, et al.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designed export promotion service use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goal achievement: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export performance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2, 41(4): 680-691.
- [14] 姚凯,李晓琳.基于制度理论的创业企业社会创新实现路径[J].管理科学,2022,35(3):58-72.
- [15] CASTRO-ARCE K, VANCLAY F. Transformative social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assist community-based initiativ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4: 45-54.
- [16] MEYER K E, ESTRIN S, BHAUMIK S K, et 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entry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1): 61-80.
- [17] 凌鸿程,阳镇,陈劲,等.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鞭长莫及”抑或“如臂使指”[J].科学学研究,2023,41(5):936-949.
- [18] BAKER T, NELSON R E.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5, 50(3): 329-366.
- [19] 黄艳,陶秋燕,高腾飞.资源拼凑:起源、研究脉络与理论框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3):151-160.
- [20] 方勇,李芬,安超男.资源拼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12):167-173.
- [21] 李毅.平台式购买: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新型策略——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6):137-146.
- [22] 王永进,冯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8(2):24-42.
- [23] 沈荣华.推进“放管服”改革:内涵、作用和走向[J].中国行政管理,2019(7):15-18.
- [24] 郑焯,姜蕴珊,吴昊.释放改革红利:“放管服”改革如何提升中小企业创新绩效[J].中国公共政策评论,2022,22(2):129-151.
- [25] 夏后学,谭清美.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如何影响技术创新[J].财贸经济,2017,38(5):129-146.
- [26] 杨震宁,李东红.政府监管、鲶鱼效应与知识产权管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J].中国管理科学,2010,18(6):177-184.
- [27] 蔡地,万迪昉.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吗?[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33(4):121-128.

- [28] 刘遥, 吴建南. 简政放权、科技公共服务还是双管齐下[J]. 中国科技论坛, 2018(12): 1-8.
- [29] DEWETT T, JONES G R.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organization: A review, model, and assessmen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1, 27(3): 313-346.
- [30] KOISOVA E, HABANIK J, VIRGLEROVA Z, et al. SMEs financing 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Slovak Republic Regions [J]. Montenegri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13(2): 129-140.
- [31] KOZUBIKOVA L, KOTASKOVA A.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factors on the quality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J]. Transformations in Business & Economics, 2019, 18(1): 95-108.
- [32] 史红梅.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要打好知识产权保卫战[J]. 人民论坛, 2019(28): 84-85.
- [33] REYNOLDS C L, ROHLIN S. Do location-based tax incentives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quality of business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4, 54(1): 1-32.
- [34] 李成顺. 充分发挥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重要作用[J]. 技术经济, 2020, 39(4): 132-136.
- [35] 李玎玎, 李雪灵. 环境动态性、资源拼凑与中小企业创新[J]. 财经问题研究, 2021(4): 123-129.
- [36] 叶宝升, 余传鹏, 林春培, 等. 管理创新与中小企业竞争优势——资源拼凑能力的非线性中介作用和领导下属认知一致性的调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023, 35(2): 94-105.
- [37] 曹艳华, 姜丽璇, 周健. 中小企业创新网络、资源拼凑与创新绩效——被调节的中介模型[J]. 管理现代化, 2021, 41(6): 62-68.
- [38] 方勇, 李芬, 安超男. 资源拼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J]. 科技管理研究, 2019, 39(12): 167-173.
- [39] 杨栩, 李润茂. 双元创新视角下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13): 1-7.
- [40] DIANA S. Persistence of innovation in unstable environmen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firm's innovative behavior[J]. Research Policy, 2014, 43(4): 726-736.
- [41] 钱锡红, 杨永福, 徐万里. 企业网络位置、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一个交互效应模型[J]. 管理世界, 2010, 26(5): 118-129.
- [42] SAMINA Q, ABDUL K K. Red tape, resigned satisfactio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negative employe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esting a model of moderated mediation[J].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2015, 35(4): 307-332.
- [43] VAN RYZIN G G. Service quality,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citizens'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US[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5, 17(3): 425-442.
- [44] 张立荣. 当代中国服务型政府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状况问卷调查数据统计与展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45] SENYARD J, BAKER T, DAVIDSSON P.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owards systematic empirical testing[J].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2009, 29(5): 5.

Reform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Resources Bricolage and Persistent Innovation of SMEs

Zheng Ye^{1,2}, Wang Yiwei¹, Bao Xuhan¹

-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Th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delegating powers, and improving services” reform is considered a crucial measure for easing the burden on enterprises, stimulating their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promoting their development. However, research on its impact on the sustained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s lacking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impact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of th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delegating powers, and improving services” reform on the sustained innov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ere theoretically constructed and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441 domestic enterprises as subjec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delegating powers, and improving services” reform and its three dimensions—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s,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are positively influencing the resource assembly and sustained innov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mong these,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services to sustained innov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promoting resource assembly is more pronounced. Resource assembly is found to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delegating powers, and improving services” reform and the sustained innov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xploratory resource assembly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exploitative resource assembly.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delegating powers, and improving services” reform differ markedly among enterprises in various industries, years, and region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are condens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Keywords: reform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enterprise persistent innovation; resource bricolage